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By STEVEN B. MI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332pp.

183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文人招健升溯西江而上展開一段「苦旅」：他此行目的是將裝着侄兒屍身的棺木帶回廣州南海縣的家鄉橫沙村。兩名侄兒背井離鄉前往黔桂交界的重要貿易市鎮——古宜經商為生，卻不幸染病身亡，招健升在下游梧州得知噩耗，隻身奔赴上游為二人收棺回鄉。他在旅途中寫下的感懷詩詞告訴今天的讀者，在19世紀的西江流域，關於親人外出謀生的悲劇還遠不止此，親人離別、家庭離散、妻子苦守空房、丈夫別娶不歸的故事每天都在西江沿岸的無數家庭中上演，無論是官宦世家、文人學士，還是普通百姓、商販走卒，這些行為貌似是每個個人或家庭出於謀生的意願和發展的選擇，卻也是16至19世紀，明清王朝國家由珠江三角洲的帝國核心地區向西江中上游地區擴張過程中，給無數個人與家庭所帶來的機遇、挑戰和衝突。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麥哲維(Steven B. Miles)之新作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就試圖透過在西江上下游往返遷移的個人與家庭的一系列離散實踐(diasporic practices)，展現出面對着無法抗拒的國家政策和充滿誘惑的時代機遇，從珠江三角洲前往西江上游地區的王朝官員、科舉學生和流動商人之「私利」如何與國家的版圖擴張達成一致，他們既成為了明清王朝控制西江上游流域的「帝國中介者」(Imperial Intermediaries)，也在此過程中達到獲取個人、家庭、家族在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最終目的。

除導言和結論外，全書共五章，分兩部份討論兩個相互牽連的重要議題：第一部份(第一至三章)「帝國中介者」，討論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離散人群(diasporas)——官員、學生和商人——如何在向西江上游的遷移活動中成為明清王朝控制邊疆地區的帝國中介者。第二部份(第四至五章)「離散家庭」(diasporic families)分析離散人群的家庭結構、成員關係和發展策略，討論他們如何在地理和地位流動情況下，通過維繫或者改變夫妻、家庭和宗族關係，從而實現個人與家庭的存續和發展，揭示廣府人在西江流域的移民活動受家庭和宗族需要、策略與網路的形塑。

第一章考察明清時期前往西江上游擔任地方官員的廣府士人。明代後期，在廣西擔任地方官的廣府人比例很高，到1570年代人數達到頂峰。在

1570年前後針對西江上游地區擴張的軍事行動中，霍韜、霍與瑕等一批出身廣府的地方官員在朝廷制定軍事策略和邊疆政策中起着重大影響，並且幫助建立新的地方行政機構，如廣西西南部的新寧州、廣東西部的東安縣和西寧縣，更多廣府人被派往這些州縣為官，而稅收、貿易、設立學校等活動的開展，吸引與其有着親緣或地緣關係的商人、教師、學生等群體向西江上游地區流動。廣府官員不但促進和推動明王朝對西江上游開疆拓土的計劃，他們的親屬和族人也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獲取利益。明清鼎革之際，出身廣府的官員與國家之間的這層關係遭到削弱。盛清時代，廣府人被派駐到西江上游地區為官的人數急劇減少。

第二章聚焦於西江上游州縣入籍的廣府學生。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大量珠三角廣府人是在家鄉以外地區獲得學籍，從而登記入學取得科舉功名，尤其是那些由出身廣府的官員幫助設立的州縣，廣府學生如潮水般湧入。然而從清初開始，西江上游各地對移民學生的排斥加劇，嚴禁各種形式的「冒籍就考」。1760年後，廣府移民學生逐漸從西江西部支流的偏遠州縣向位於西江幹流沿岸的東部、中部的商業市鎮梧州、桂平、馬平等地轉移，這一潮流延續至19世紀初。明清王朝一直鼓勵移民學生前往西江上游的邊疆地區，以此表明國家在土著頭領長期控制的地域中建立起穩定的「文明」社會，廣府移民學生由此成為帝國的中介者，而他們及其家庭也利用王朝國家整合帝國邊疆的控制政策，來培養和壯大自己在西江上游地區的移民精英，從而成就或支持他們的家庭和宗族維持在珠三角的精英地位。

第三章關注明清帝國整合西江上游邊疆與廣東商人在西江流域建立貿易網路之間的互惠關係。作者認為，明清王朝國家對西江上游邊疆地區的整合，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對沿岸貿易的培育和徵稅，因此廣東商人在此起着至關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在珠三角的家庭、家族也在此擴張過程中獲益。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清朝政府支持並鼓勵廣東商人在西江上游獲利，大規模長途貿易被廣東商人壟斷，兼營借貸業務的雜貨鋪也在土著控制地區滲入當地傳統的市場經濟。19世紀廣東商人向廣西北部、西部、南部的山區挺進，商人進入山區採購山貨，僱傭苗侗土民放木排、運輸土產到下游，古州、柳州、百色等地是木材、桐油、八角等山貨的重要出產地和交易中心，售賣到珠三角各地並出口歐美。土著頭領勢力與外來商業利益糾纏，土司與店鋪商人也形成「庇護—代理」關係，一些土司深陷債務借貸。在不同方向上，明清帝國的版圖擴張與廣府商人商業網絡的拓展形成互助互利的密切關係。

第四章探討廣府男性移民的性別和家庭動力。男性移民是廣府家庭追求

發展的一種策略，這種勞動力策略在1570年之後顯現，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持續流行。無論是珠三角婦女還是西江上游的本土女性，都在支持廣府男性移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該章節探討三類行動者(actors)——珠三角的原配妻子和家庭成員、男性移民及多樣化的婚姻策略、上游留住廣府男性的本土婦女——在離散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形塑了西江上游的移民活動。

第五章考察僑居和定居移民對於宗族的影響，涉及上游的移民活動如何幫助和支持宗族建構。一些定居上游的移民後裔逐步建立和發展起自己的家族和宗族組織，與珠三角的宗族建立起親屬關係，「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是維持和創造上下游宗族關係的核心。18至19世紀，將上游親屬關係整合進入宗族譜系的宗族建構包含着一種交換：上游親屬通過經商或科舉功名得來的錢財為下游宗族提供捐贈，下游宗族為上游的廣府人來源的世系追溯提供支援。這種交換對19世紀以來的西江上游地區影響深遠，以至於擁有廣府人的祖先源流成為一種地位標誌，其類似於為當地人提供地位的一種國家標誌。很多非漢人群家族也開始攀附廣府移民傳說來提升地方名望、改變土著身份，從而與王朝國家建立關聯。

作者將此書定位為講述流動的歷史(a history of mobility)，追溯那些原居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低地居民(lowlanders)如何沿西江而上進入高地(highlands)的離散實踐。文中所指「高地」主要分佈在西江中上游的廣西，也涉及廣西下游的廣東西部山區，以及位於廣西更上游西江支流流域的貴州南部、雲南東部和越南北部的高山丘陵地區。「離散實踐」包括在廣西當官、在上游學校入籍為學、從事商業貿易、維持分離家庭以及建立跨區域的親屬聯繫等。作者站在中國南方西江流域的區域視角去探討移民過程與明清帝國的邊疆拓展歷程，希望呈現移民精英如何通過國家名義來追求自身的社會經濟利益，從而與地方社會建立起橫向聯繫。他將移民研究的重要概念「離散」(Diaspora)引入，為分析帝國在邊疆的擴張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強調內部離散(internal diaspora)群體在帝國整合邊疆地方過程中的重要性，也在嘗試一種16世紀以來全球人口流動視野下的中國南方區域移民史的書寫模式。

此外，作為本書另一重要議題，作者力圖揭示珠三角的廣府家庭、宗族對移民活動的支持，並將其作為一種達到社會經濟發展的策略(strategy)，對西江上下游流域之間關係的理解不再局限於以河流體系為主導的地理聯繫，更增添以「家庭」利益為出發點的自主性選擇與策略性概念，並且將16至19

世紀間移民活動與明清王朝對西江流域的軍事、政治擴張活動及國家整合政策相互關聯，使得「離散家庭」的遷移實踐與國家邊疆擴張政策的實施互為表裡。考慮到珠三角是大量海外移民的祖居地，作者將近代早期西江流域的移民活動與近代海外移民活動進行對照，強調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希望能夠突破目前將中國國內移民與海外移民幾乎獨立研究的學術現狀。而在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上，作者不但對刑科題本、吏科題本、內閣大庫檔案、朱批奏摺等官方檔案進行細緻爬梳，也持續十多年時間在西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展開田野調查，搜集大量碑刻、族譜、地方志、文人著述等民間文獻加以細緻解讀和論述，為讀者呈現更為細緻而豐富的民間視角。

然而，由於作者以珠三角「廣府移民」為主要的觀察和分析對象，對西江上游地區本土人群和地域情況的敘述不免帶着濃重的「下游」視野，上游本土人群呈現出一種「被動」捲入珠三角經濟網絡和帝國拓展過程的「形象」。這種研究視角在以往的帝國史和移民研究中屢見不鮮，其成熟的敘述模式也讓讀者難以洞察並思考西江上游本土人群自身的「能動性」，以及他們與珠三角「離散」人群以及其承載的「帝國象徵」之間的「互動性」。這恐怕也使得作者不斷強調的珠三角「離散」人群成為「帝國中介者」過程中的利益糾葛和運作機制，有着更多的闡釋與討論空間。此外，西江上游流域也是從16世紀開始廣泛接納中國其他地區——如福建、江西、湖南——移民，那麼本土人群在與移民接觸過程中，其本身的地域觀念和文化表徵是否也得以逐步「形成」？他們如何去感知和看待所謂的「外部世界」？不同「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落實到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網絡之聯結與重構的動態過程之中？這些問題是否能夠為我們以「人的離散實踐」為中心的「流動的歷史」，來理解16世紀以來全球人口流動背景之下的「地方性」形塑與「區域—國家—世界」觀念的興起提供一種更為廣闊的思考路徑？筆者以為，這些問題視角和思路的轉變，或許能夠成為今後聯結全球史、移民史和區域社會史之間的重要契合點。

黃瑜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